



张伯存 卢衍鹏◎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Shift in the Nine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张伯存 卢衍鹏◎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Shift in the Nine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 张伯存, 卢衍鹏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12 - 5410 - 8

I. ①二… II. ①张…②卢…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6636 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著 者: 张伯存 卢衍鹏

责任编辑: 钟祥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5410 - 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1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 4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内容、方法及目的 / 7	
第一章 “人文精神讨论” 论析	12
第一节 “人文精神讨论” 的背景 / 1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和现实关怀 / 14	
第三节 精神问题的当下性及与文学的关联 / 18	
第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转型中的王朔现象	24
第一节 革命文化的子民 / 25	
第二节 亵渎知识分子的文化策略 / 26	
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弄潮儿 / 28	

第三章 20世纪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	32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生产的嬗变 / 32	
第二节 文化语境：市场经济、大众文化与文学生产 / 36	
第三节 生产主体：写作者的分化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41	
第四节 出版主导：体制改革与品牌生产 / 46	
第五节 评价机制：传媒策略、娱乐精神与文学导购 / 53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传媒	58
第一节 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 / 58	
第二节 传媒改制与文学消费的“张力” / 61	
第三节 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 / 65	
第四节 个人尊严与社会公正的诉求 / 70	
第五节 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 / 72	
第五章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新市民小说”	77
第一节 理论旅行与社会想象 / 78	
第二节 文学生产与文化诉求 / 82	
第三节 感性化叙事与文学公共空间 / 85	
第六章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91
第一节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 / 91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本体性 / 93	
第三节 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 / 99	
第七章 文学如何叙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07
第一节 “现实主义冲击波”起波澜 / 107	
第二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学？ / 110	
第三节 文学如何表征“市场” / 113	

第八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中的“私人生活”：陈染、林白论	120
第一节 公共生活、文学自律与“私人性”写作 / 121	
第二节 性别政治、欲望症候与自恋共同体 / 125	
第三节 文化隐喻、时代症候与合法性困境 / 130	
第九章 体验“欲望”：朱文、韩东论	135
第一节 欲望的多义：情爱叙事的嬗变 / 136	
第二节 欲望的异化：性爱元叙事与非理性精神 / 139	
第三节 欲望的悖论：“纯粹”的限度与叙事的张力 / 145	
第十章 20 世纪 90 年代散文论	152
第一节 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标本 / 153	
第二节 张中行：风雨故人来 / 158	
第三节 “小女人散文”的别样风情 / 164	
第十一章 无疆界写作	169
第一节 文学地理：进入秘境的孤旅 / 170	
第二节 历史书写：在融入中贴近心灵形象 / 174	
第三节 信仰精神：儒家文化之外的异质建构 / 178	
第十二章 抵抗现代性的寓言	183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200

绪 论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转向与 社会转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20 世纪 90 年代，似乎非常遥远了，但又仿佛恍然如昨，感觉刚刚过去一般，甚至我们有时感觉仍然置身其中。它是世纪之交的时段，它是 20 世纪的尾声、黄昏，延续了 20 世纪的主题，但它又是新世纪的序幕，就中国而言，21 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型、大变革在这一时刻已初露端倪或孕育滋长。与“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①就中国社会历史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迥异于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文革”、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革命的中国的历史，它们被迅速遗忘，成为遥远的历史故事，不再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生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至多只能充当一个个幽暗的背景和底色。20 世纪 90 年代是削平历史、摒弃深度的“去革命化过程”，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做着有朝一日发财的梦想。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合理性”就是“下海”经商、发财、物质享受、私人生

^①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序》，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 页。

活的安逸。发财梦想和物质享受的渴望潜伏在无数人心中，它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要的“情感结构”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似乎远离我们而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生意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都别影响我们做生意。这句话中不是透露出对经济、市场、金钱的顶礼膜拜吗？这难道不是“市场意识形态”吗？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吗？同样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购物、娱乐等等）的“政治”还少吗？其实，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恰恰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剧烈转变的年代，给人以希望的年代，矛盾凸现的年代，充满生机的年代，阶层分化的年代，让人困惑的年代。这是个复杂的年代，这个年代有许许多多未解之谜等待着研究者的解答。经济改革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社会共同体？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形态？什么样的文化表达和交往空间？这些都没有预设的、固定的答案。

对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性的关口。就在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退休后的邓小平南巡，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南巡谈话”一举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举棋不定、徘徊不前的局面，一代伟人又一次为十字路口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后，当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启动。而考虑到政策、文件、会议精神的时差效应，要到1993年，党中央决策才会全面传播到社会层面，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改革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动员机制确立起来，具体改革方案陆续出台。1993年，新一轮改革全面铺开，进入实质性阶段，每一个改革方案都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持续的影响。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进行分税制改革。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是，经济改革创造了经济持续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起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呈现，它深刻地触动了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它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目标、方向、动力，同时也改变着这个社会个体的命运，它不仅重新构造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同时也重塑着人们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观念。比如，物质追求的至上和精神的放逐，物欲的极度膨胀和理想主义的萎缩。

另一方面，经济改革触发了新的社会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其自身的困境也凸现出来。经济低迷，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而一些地方的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还有下岗问题、三农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别问题、私有产权问题、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问题等等，都是关系到中国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大问题，国际方面还有全球化加速、亚洲金融风暴等等，都对产生重要影响。

而在1993年，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三年、论争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①这场讨论是知识分子在经历苦闷、彷徨之后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应对市场、商业化、消费主义等现实问题的一次集体发声。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现代转化的继续，而且对一百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意义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建立中国人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如何维持当代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就文学而言，认同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表征的问题，一个“叙述”的问题。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文学创造提供了新的可能。反映与揭示这个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文学应该有充分理由说出它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和表达，建构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想象和叙述。

20世纪90年代文学处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的节点，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文学的转向与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转型有着深刻

^① 这场大讨论最早发端于文学界，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刊登的王晓明、张闳、徐麟、张柠、崔宜明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被视作这场讨论的肇始。

而潜在的一致性。我们应该把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充分揭示出来，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复杂的转向过程、面向、动力、机制做出精确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总结、反思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更主要的是，通过历史性的清理和反思，重新激发文学对现实世界和终极价值进行质询、探索与思考的能力，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与 社会转型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谈论这个话题首先要反思的恰是“文学”这个概念，对这个“元概念”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决定了文学批评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文学教科书和中文系课堂对文学的一种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根深蒂固，即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是虚构的艺术，是审美的对象。按照这样的标准和逻辑，一个更纯粹的概念应运而生，它就是“纯文学”，一个蕴含着本质主义倾向的概念。其实，从来没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文学是一种被历史性的建构机制和过程所决定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新批评”以来的一种纯内在批评观念支撑的许多批评方法，即内在批评只是一种幻想，他强调文学文本政治阐释的优先性，“政治阐释是所有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界”；“每一事物在‘最后的分析之中’都是政治的”。^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李陀对“纯文学”的反思就显得难能可贵，其后，评论家蔡翔又发出了“何谓文学本身”的有力诘问。但是这样的反思在当代文学评论界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以促进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反思，我们看到一大批功成名就的评论家固守着20世纪80年代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哺育而养成的文学趣味和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9、22页。

精英意识，依然在当代文学中苦苦寻觅存在的深度、精妙的叙事艺术和美学旨趣，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体制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殿堂里享受着成功的果实。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定义之外，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当然，就这句话的前半句而言这种看法并不新鲜，“文革”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受其害，有人至今记忆犹新，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当然不是回到以前庸俗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政治附庸论，毋宁说，这是“去意识形态化”之后的重返，一个否定之否定，一次螺旋式的上升。上述这句话的后半句，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这样表述：“文学是一个暴露意识形态，并对其进行检验、质疑的领域。”^① 其实，从更深广的社会历史来说，就当今的社会语境而言，下面的这一对文学的认识也许更为妥贴：“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多样性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文学看成是表征社会机制和实践的意指符号和系统，那么，文学如何对社会进行表意实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意实践？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不再是封闭的、自足的，它打开了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血肉联系、内外贯通的管道。这样，理解20世纪90年代文学才会产生新的立场、视角和新的可能性。

讨论20世纪90年代文学离不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由“革命中国”到“改革的中国”、由“社会主义中国”到转型期的中国。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阐释必须放置在资本、现代性、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诸种视阈中，才能进行深入而广阔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文学必须始终在这个社会历史格局和背景下进行观照方能得到有效阐发。这需要借助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它对文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出挑战，而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

“理论的作用一直就在于扩大文学作品可以回答的问题的范畴，并且把

^① [美] 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50页。

^② [美] 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用哪些不同的方式抵制它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或者使其复杂化。从根本上说，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①

如果说存在一个“80年代气质”：激情、浪漫、文化、启蒙、精英、现代化、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等，那么也显然存在着一个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的“90年代特质”或“90年代性”：利益、现实、市场、大众、个人、消费、欲望、体制、阶层、接轨、全球化等等，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价值的同一性分崩离析了，这是一个貌似多元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要特征是个人化、商业化、利益化、世俗经验和世俗存在压倒了精神追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化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和重组。这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社会土壤。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意识形态控制的世界，其历史转向的过程、动力、机制十分复杂。

我们必须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进行“历史化”审视和“总体性”观照。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辩证总体的联系有两个维度，纵向包括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横向则包括这个过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以总体性立场关照20世纪90年代文学，就是在承认文学独特的审美属性的同时，把它看作一种历史进程的直接表现形式，历史总体发展的环节、过程，同时将它与社会基础相关联，最终看到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倾向性，而我们只有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与世界图景的认识越深入，我们才越能够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产生全面、深刻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远甚于20世纪80年代，但它常常被某些流行的观念所遮蔽。如何把文学创作、现象与社会思潮（如“人文精神”讨论、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等）以及传媒、市场、资本、全球化的复杂关系切实有效地揭示出来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① [美] 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 转型研究的内容、方法及目的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必须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纳入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产以文学期刊为中心,文学期刊编辑的意识、品味、策划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坛创作风貌,成为风向标,甚至将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人推到文坛中心,聚光灯下。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期刊组织的作家笔会是一个主要的文学生产模式。20世纪90年代的作者、读者、出版者、文学管理体制的角色、身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消费主体和消费趣味的变化非常明显,新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及前景催生出新想象,消费主义意识持续加强,跨国文化资本、媒介资本对文学创作、出版、销售等领域的渗透逐渐增强,出版社成为文学生产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这是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

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显著不同。譬如,“王小波热”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媒体炒作的典型案例,在他身上能够看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媒体的巨大形塑力量,看出新兴媒体与文学的新型关系,媒体以传播快捷、受众庞大、擅长命名的特性直接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产和消费,在媒体塑造下,王小波是体制外自由写作的代表,一个“文化英雄”的符号,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这样的命名和定位背后又与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想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所谓“情感还原”、“生存本相”的评说一定意义上说可谓不着就里。它是精神世界溃退的表征,庸常的日常生活经验主导着价值判断,表现了日常生活的压抑性力量以及人的无奈的精神状态,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变迁的根由。对它的研究要着力揭示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要揭示出“新写实主义”文学怎样建构起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这是文学研究的力量所在。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的重组，一个新的阶层出现了，它就是中产阶级，它同时还有一个暧昧的称谓“新市民”。“新市民小说”或者中产阶级写作应运而生，在这些小说中，一种物的占有的世俗性的欲望、物质化的利益成为人的行为的意义范畴，个人的主体性获得了世俗化释义，生活物化和私有化了，这类小说将之强化与征兆化了。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主体嬗变为20世纪90年代的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角逐拒斥了所有乌托邦式的精神皈依，一种最原始的拜金主义被重新激活，曲折传达出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诉求，它带有某种粗鄙化的精神形态，滋生出平庸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了人的精神和价值关怀，构建了一种新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文学的一种新的想象关系。它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启示，一个世俗性的物欲的时代因市场的确立而降临。20世纪80年代王朔的小说是其先声，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中大行其道的“中产阶级写作”及时尚媒体塑造的“成功人士”形象是其自然延续。这一路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界当时热衷于讨论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相呼应，是这一思潮的文学表征和想象。市民社会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新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些小说及其蕴含的文化含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就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而言，这种“私人化”文学想象与20世纪90年代公共生活的巨变有着重要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已经由“政治化”社会蜕变为“去政治化”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高度“私人化”，对“私生活”文化想象的热衷与对“私有制”的社会想象及思潮同根同生。在此意义上，“新市民小说”与“私人化写作”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前者的旗帜正是回到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所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经济生活”，即发财的自由、消费的自由。生活的高度经济化恰是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特征。我们有必要质询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常生活的合理化是怎样完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

化的分析是，私人生活、私人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解放思潮有着文化脉络上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序幕，是其“符号生产”或“文化生产”的经济学运作。

返观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它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小说中，乐观的现代化情结逐渐消解，多少呈现出一种平民情感的本能冲动，作家的叙事视角移向社会底层，蕴含着一种道德力量，对普通人命运的焦虑与关怀，终结了对现代性的浪漫憧憬和平等、富裕的乌托邦想象，表征了社会转型期涌现出来的诸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一路数的小说在横向上与“新市民小说”、中产阶级写作构成对话、回应关系，在纵向上，一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构成差异性的历史关联，一方面是21世纪初方兴未艾的“底层文学”的先声或源头。必须将之安置在这一历史脉络里重新考量或省思，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对它们的历史性的研究必须和中国的改革进程与历史以及“市场”、“全球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等问题结合起来考量。总之，《大厂》、《破产》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留下了这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叙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叙述如何可能？

上述文学现象都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意识形态”或者说“去政治化的政治”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困境是因为把现实的合理性作为观察和认知世界的唯一视角，成为资本全球化、新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同谋，而丧失了从话语、利益和群体的分歧、斗争和争辩的角度观察世界的方式。从世界范围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主潮没有提供一个异质性的想象空间。

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还有另外一个维度，这就是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李锐等作家的创作。他们彰显了理想主义精神，对世俗的、物欲的、商品化的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不约而同地坚守相近的美学理想，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以及人的普遍的生命价值。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的延续，体现出历史的连续性，一方面又与世俗化、商业化浪潮形成对话关系，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一种文学的异质性存在和内部的文化张力，同时也作为重要的一极，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力量和魅力，

这主要表现在鲁迅传统的自觉继承，“反现代的现代性”和“抵抗全球化”及抵抗发展主义、单一性，他们的力作《心灵史》、《马桥词典》、《九月寓言》，执着于宗教、地域、边缘、方言、沉默的少数、化外之地的书写。它们构成20世纪90年代时代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令浮躁、虚空的20世纪90年代多了份沉静、厚实，成为一种制衡的文化力量和文学精神。张炜、张承志，更是直接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范围广、影响大的“人文精神讨论”。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必须安置在这一时代的文化语境中以及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中展开，发掘他们建设性的文化力量。

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必须呼唤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思维和想象力，甚至是一种“野性思维”，需要汲取、吸收经济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如，可以尝试运用阿尔都塞式的“症候阅读”方法，将文学作为社会表象系统，读出文本与现实关系、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联系，读出意识形态话语在文本中的表征，必须考量“现实”是如何在“政治无意识”的象征性行为的运作下被有机地纳入叙事的织体中，成为文本内部的一种“亚文本”的。还应该读出文本向我们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同时它的美学效应，以及，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意义上，文本作为多重意识形态之间斗争、角力的场域，表征了怎样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及其效果。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进行症候式解读，一是内层解读，发掘其内在的文学性、叙事特质和审美质素；一是外层解读，视其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表征或症状。也就是说，一方面对文本进行“细读”，同时，特别强调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非常开阔的视野，不再仅仅将文学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作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复合体，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社会空间或复合结构。与此同时，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分析文学的能力，拓展一种更具开放态势的研究格局，从文化研究、当代社会和历史研究中获得多视角的多层次的支援。除了具有广阔的视野之外，力求把文本之外的视野和资源落实到对文本的解读上，而且视野越开阔、资源越丰富，落实到文本的难度就越大，力求将“文本之外”的能量“读入”文本内部的“肌理”中，这需要糅合、圆通的功

夫，而不是做成一个简单的“拼盘”，这对研究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现实利益分配、取舍的市场经济原则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它潜在而深入地主导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情感伦理和精神世界，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居于支配地位。自然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和情感活动，与这个“市场”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它是市场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表征，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制约是强大而无形的，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它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它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消费市场、作家的想象方式和文本叙事都有决定性的或微妙的影响。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市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文学如何表征市场？表征了怎样的市场？作家的想象力是如何受到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的？笔者试图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